

西夏史研究与阐释的新阶段

编者按:《西夏通志》融合传统与现代编纂体例,全面呈现西夏历史多维度图景,是西夏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为理解西夏在中华文明史中的重要地位奠定了坚实基础,具有里程碑意义。西夏陵申遗成功为阐释包括西夏在内的“内边疆王朝”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和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提供了新思路。本刊邀请了史金波、陈育宁、杜建录三名学者,围绕西夏历史、文化及其在中华文明史中的定位展开深度探讨。

中图分类号:K24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5744(2025)05-0001-06

西夏研究的鸿篇巨制

——《西夏通志》序

史金波

在西夏陵入选《世界遗产名录》之际,以宁夏大学杜建录教授为首的西夏研究团队,凭借着对学术的执着追求与深厚积淀,又推出一部重磅成果——《西夏通志》。这部多年精心编纂的大型西夏史著作共11卷(12册),包括《西夏史纲》《西夏地理志》《西夏经济志》《西夏职官志》《西夏军事志》《西夏人物志》《西夏部族志》《西夏风俗志》《西夏语言志》《西夏文献志》《西夏文物志》,共400余万字。首卷《西夏史纲》以全景式的视角,为读者徐徐展开西夏王朝兴衰更迭的历史长卷,其余各卷则从不同维度分别展示西夏历史的一个重要侧面。

《西夏通志》为2015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成果,立项前我和杜建录教授多次交换意见,立项后我们的交流就更多了,我还参与了《西夏部族志》的撰写、《西夏职官志》的审读,书稿付梓前又得以先睹,感到此书的编纂意义重大,功力深厚,贡献良多。

众所周知,宋辽夏金之后的元朝为前代修史时,只修了《宋史》《辽史》和《金史》,未修西夏史,仅在这三史的后面缀以简约的“夏国传”“西夏纪”“西夏传”,概略地介绍了西夏主体民族党项族和西夏

建国后的大事简况,以及各自与西夏的交聘争战。历史资料的稀缺,使得人们对西夏历史和社会的认识模糊不清,感到西夏史在中国历史链条中似乎是个缺环。清代以来,有识之士拾遗补阙,先后编撰《西夏书事》《西夏事略》《西夏纪》等著作,均是对传统典籍中文献资料的编年辑录,不是一部完整的西夏史。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推出多部重要的西夏史著作,尤以吴天墀《西夏史稿》影响最为深远。但一方面章节体很难容纳更多的内容,另一方面出土的文献资料特别是西夏社会文书尚未公布和释读,很难弥补元代没有编纂西夏史的缺憾。

为此,《西夏通志》研究团队在系统占有资料特别是近年公布考释的西夏社会文书的基础上,将我国古代史书中的纪传史志和近代以来的章节体专史结合起来完成的一部大型西夏史著作。如“西夏史纲”是西夏王朝兴衰更迭的历史长卷;“西夏史志”,相当于“正史”中的“志”,包括地理志、经济志、职官志、军事志、部族志、语言志、文献志、文物志等,但内容和方法与“正史”中“志”不大相同,而是根据资料和当代学术的发展,赋予新的内容,显示出新的活力。如“经济志”中的经济关系、阶级结构

收稿日期:2025-08-11

引用格式:史金波,陈育宁,杜建录.西夏史研究与阐释的新阶段[J].宁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47(5):1-6.

和社会形态;“职官志”中蕃汉官名;“军事志”中的战略、战术与战役;“语言志”中的语音和文字;“文献志”已不是传统《艺文志》中的国家藏书,而是所有地下出土文献和传世典籍文献;“人物志”,相当于人物传记;“表”包括世袭、帝号、纪年、交聘、大事、战事、词汇以及名物制度异译对照等。由此可见,《西夏通志》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元朝没有纂修一部西夏史的缺憾。

《西夏通志》的特点是内容丰富而平实。正如首卷《西夏史纲》在凡例中所提出的“本史纲在百年西夏学基础上,系统阐述西夏建国、发展和衰亡过程以及西夏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面貌,不是资料考辨和某种观点的阐述”。其他各卷也都在各自的凡例中规定,该卷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客观叙述,不是资料考辨和某种观点的阐述。这样明确的自我约定,表明了作者们的科学、客观的治学态度和大众化的表述理念,充分彰显了作者团队严谨的治学态度和致力于学术大众化传播的理念。他们十分注重吸收近些年来在西夏法律、经济、军事、文化诸多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把认真搜罗的相关文献、文物资料展陈于前,将成熟的学术观点归纳于后,没有诘屈聱牙、艰涩难懂的争辩,只是客观地叙述历史,娓娓道来,毫无强加读者之意,却能收平易推介之功,让读者在轻松愉悦的阅读体验中,自然而然地接受西夏历史知识。这种独特的写作风格,真正实现了学术著作的传播,让高深的学术知识走出象牙塔,走进大众视野。

《西夏通志》的另一个特点是系统而全面。全卷不仅多方位地涵盖了西夏历史,即便是每一卷也都能做到在各领域中尽量搜罗各种资料,做到全面系统。如《西夏文献志》收入西夏世俗文献167种,出土西夏佛教文献556种,传统汉文典籍中的西夏文献41种,历代编撰的党项西夏文献21种,还有亡佚的西夏文献25种,共达810种之多,同时对每一种文献都有介绍,为读者提供了翔实的西夏文献盛宴,可谓西夏文献的集大成之作。

《西夏通志》还有一个亮点是多数卷的末尾附有“表”,如《西夏史纲》卷的《西夏世袭表》《西夏帝号表》《西夏纪年表》《西夏交聘表》《西夏大事年表》《西夏学年表》,《西夏地理志》的《党项与西夏地名异译表》,《西夏职官志》的《党项与西夏职官异名对照表》《西夏蕃名官号一览表》《夏汉官职译名对照表》《机构译名对照表》,《西夏语言志》的《西夏词汇表》等。这些“表”以简洁明了的形式,将复杂的历史信息清晰地呈现出来,如《西夏学年表》呈现出

百年西夏学发展脉络,《西夏词汇表》以2000条的篇幅分门别类地展示出西夏语的常用词,每条词有西夏文、国际音标和汉译文三项,非常方便读者检索使用。这些附录有的是对正文的补充,有的是对正文的提炼,有的则与正文相呼应,成为各卷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充分体现了作者对各研究领域的深入理解、长期积累以及对读者需求的贴心考量。我想,只有作者对该领域的全面了解和深耕细作才能做出这样既专业、又方便读者的附录,我们应该对作者们为读者的精细考量致以诚挚的感谢!

本书作者团队阵容强大,领衔的杜建录教授为长江学者,他一人担纲了《西夏史纲》《西夏经济志》及部分《西夏军事志》的重担。其他各卷作者均是这些年成长起来的学术带头人和学术骨干,据我所知,他们大多数主持完成两项以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有的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冷门绝学团队项目。这个研究团队经过多年历练,有良好的研究基础与合作传统,十多年前也是由杜建录教授主持的4卷本《党项西夏文献研究——词目索引、注释与异名对照》(中华书局,2011年出版),这个团队的大部分成员参加了这个项目的资料建设工作,他们在党项西夏文献整理过程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们中有的还参与《西夏文物》整理出版,看得出《西夏通志》是在坚实的基础上厚积薄发,他们的学术积累得到了充分的运用和表达。

他们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大多都熟悉西夏文。随着近代西夏文文献的大量发现,特别是近些年来黑水城出土文献的系统刊布,西夏文文献成为解读西夏历史文化的重要资料基础。掌握西夏文成为解读西夏历史文化的关键。熟悉西夏文译释的本书作者们凭借这一优势,在研究中可以将汉文史料和西夏文资料以及文物资料同时充分利用,相互印证,有机地融汇在一起,作出特殊的深层次解读,从而取得新的符合史实的客观认识。他们如同穿越时空的使者,借助古老的文字,与历史对话,从而得出更符合史实的客观认识。揆诸各卷内容,都不乏利用新的西夏文资料展现该卷历史内容的实例,这种在中国史研究中大量利用民族文字资料的特殊手段彰显出本书的特点,展现出作者们经过艰苦学习、训练而能熟练应用西夏文的亮丽学术风采。

最后,我要说的是《西夏通志》作者无论研究环境优劣,都能正确把握国家对“冷门绝学”长远战略,以研究西夏历史文化为己任,以彰显其在中华

文明中的价值为使命,坚守岗位,坚持学术,默默耕耘、潜心研究,努力发掘西夏文化在中华文明发展中的历史性贡献,用实际行动和优秀成果推动着西夏学的发展。对他们这种难能可贵的学术坚守点赞,对他们的学术品格表示尊敬!

随着西夏陵入选《世界遗产名录》,西夏研究将愈加受到有关部门、学术界和社会的关注和重视。

此重要成果的推出无疑将会给方兴未艾的西夏学增添新的热度,让关心西夏的读者们有了认识西夏历史的新途径,为读者打开西夏历史知识的全新窗口,助力大众深刻理解西夏文化在中华文明中的重要地位,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发挥积极的作用。

(史金波,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工作室专家)

西夏学的里程碑

——《西夏通志》序

陈育宁

西夏史学史研究表明,西夏学一百多年的发展史,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20世纪20年代至80年代。从俄国探险家掠走黑水城西夏文献开始,苏联学者因资料上的优势,率先开始了西夏文献的整理研究,出版了一批论著。日本及欧美的学者也开始了西夏文献的研究。这个阶段,我国学者在西夏文文献资料有限的情况下,开始着手对西夏语言文献、社会历史及宗教文化等方面的研究。总体来讲,这一时期国外西夏学特别是俄罗斯西夏文献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第二阶段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中国西夏学的研究出现了新的变化。70年代开始,西夏陵等一批西夏遗址的考古发掘,90年代以来的俄、中、英、法、日等国藏西夏文献的整理出版,西夏学的主战场逐渐由国外转移到国内,西夏学的内涵从早期的黑水城文献整理与西夏文字的释读,拓展成对党项民族及西夏王朝的政治、经济、军事、地理、宗教、考古、文物文献、语言文字、文化艺术、社会风俗等全方位的研究,完整意义上的西夏学逐渐形成,和敦煌学、简牍学一样,成为一门涵盖面非常广泛的综合性学科。西夏学取得的丰硕成果,表明已开始走出冷门绝学的境地,出现了初步的繁荣局面,学界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和赞誉。2007年,在北京召开的《中国藏西夏文献》出版座谈会上,史学大师蔡美彪先生曾说:“我深切地感到30年来,我国西夏学、西夏史的研究取得的成绩非常大,甚至可以说,将这30年的中国历史学的各个领域比较起来的话,西夏的文献整理和西夏学研究的业绩,应该是最显著的领域之一。”(《西夏学》第3辑,2008年)

西夏学在新的发展进程中,研究机构及学术团

队的建立发展壮大,是必要的条件和基础工作。西夏故地在宁夏,宁夏大学一直把西夏学作为重点建设的学科,2001年,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被教育部批准为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8年教育部批准更名西夏学研究院。基地建设二十多年来,他们立足当地,着眼长远,培养队伍,积极开展具有学科发展意义的重点项目研究,已成长为国内外西夏学领域一支有科研实力、能够承担重大项目并起到领军作用的学术团队。在这个过程中,我作为亲历者和见证者,看到杜建录教授带领的基地和团队之所以能取得突出成效,缘于他们坚持正确的学术导向,具有长远的学术眼光,尊重学术发展规律,在推动西夏学学科体系建设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必要的举措。

一是重视基础建设,组织文献整理、集成和出版。二十多年来,他们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为平台,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夏文化研究中心等单位,整理出版大型文献丛书《中国藏西夏文献》《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中国藏黑水城民族文字文献》《西夏文献丛刊》,建设大型西夏文献文物资料数据库;参与承担并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西夏文献文物研究”;将西夏文献研究由西夏文延伸到拓跋政权和西夏时期的汉文、西夏文、吐蕃文、回鹘文等多语种文献,拓展了西夏文献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二是倡导“大西夏史”。跳出西夏看西夏,从唐五代宋辽夏金元大背景下研究西夏,推动多学科交叉综合研究,揭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历史轨迹,揭示西夏多元杂糅的文化特点。将西夏学研究拓展到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

的研究。

三是重视和推进民族史学理论建设。二十多年前建在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的中国少数民族史博士点就设立了中国民族史学理论专业方向。以“多元一体”为核心的史学理论建设推进和指导了西夏研究,专业人员的史学理论素养和分析概括能力明显提高,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创新思想紧密衔接。

四是重视学术团队建设和拓宽研究视域。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已形成了有一定数量、结构配置合理的团队,研究方向涵盖了西夏历史、文化、语言、文献、文物等主要领域,十多年来迅速发展起来的西夏文化和西夏艺术研究,进一步丰富了西夏学的内涵,具有填补空白和创新的学术意义。运用中华民族史观和多学科综合研究方法,成为西夏学新的增长点。

五是重视国际合作研究,提升国际话语权。2010年成立中俄西夏学联合研究所,开展黑水城文献合作研究,形成中俄联合研究机制。连续举办八届国际学术论坛,促进国际西夏学的交流和学术资源共享;利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外译项目等各种途径,组织出版西夏研究外译著作十多种。

这些举措的坚持和落实,使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基地积累了经验,开阔了视野,历练了队伍,完成了一系列重大项目,展示了“西夏在中国,西夏学也在中国”的厚实基础。这也正是他们能够承担并高质量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西夏通志”的主要原因。

杜建录担任主编的《西夏通志》2015年获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022年完成结项,2025年正式出版,十年磨一剑,是迄今为止西夏学各个领域研究成果的集大成者。在学术指导思想上,贯穿了中华民族历史观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历史资料运用上,充分吸收了迄今国内外发现刊布的各类文字资料及实物资料以及近年来考古新发现;在叙述内容上,尽可能涵盖了西夏社会的各个方面和各个领域,力求全方位呈现一个真实、生动、立体的历史上的西夏;在编纂体例上,将我国传统的史志体和近代以来的章节体结合起来,作了有益的探索。从上述意义上看,《西夏通志》不仅是目前西夏学全面的创新性成果,而且是具有中国自主话语权和自主知识体系的学术成果。

在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西夏通志》所采用的编著体例。在中国悠久的治史传统中,不仅保留了各种记述历史的文献资料,也创造了编著史书的体

例,形成了以纪传体(如《史记》为代表的二十四史)为主流以及编年体、纪事本末体等体例的史书编纂方式,与此同时形成的还有志书体例。“志”基本属于史的范畴,“郡之有志,犹国之有史”(宋·郑兴裔《广陵志·序》),“方志是地方之全史”(白寿彝《史学概论》)。“志”更侧重于资料内容的分类编纂。以历史纵向为主线的“史”和以横向分类为主线的“志”,构成了中国传统史学的主要记述模式。传统史志体例作为中国历史庞大复杂内容的主要载体,数千年来不断改进完善,其功能和作用不可低估。但传统史著体例也有其历史局限性,如以王朝政治史为中心,忽视社会多元性;以儒家史观主导,难免片面性;以人物和事件描述为中心,缺乏历史发展内在联系及因果分析;史料的选择有局限,民间、地方、民族方面的史料缺失等等。20世纪随着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的引入,史著的章节体例渐成现代历史著作的主要形式,它以历史演进为基本线索,以科学分类和逻辑分章的形式,将传统史志的叙事方式赋予了现代学术规范,具有结构清晰、内容涵盖面广、可以跨学科综合、便于阅读和传授的特点。但史家在运用章节体书写历史中,与传统史著相比,也感到有不足之处,如对人物、典籍、制度、文化等专项内容的描述不够,一般的处理方法是简要地概括在章节的综合叙事中。白寿彝先生主编的12卷《中国通史》作了新的尝试,用传统与现代相融合的创新编纂体例,采用甲、乙、丙、丁四编结构,甲编“序说”整合文献与研究成果,乙编“综述”以时序勾勒朝代脉络,丙编“典志”解析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变迁,丁编“传记”通过人物纪传体现史实。这种创新体例将专题考据与宏观叙事结合,史料评介、制度分析、人物纪传、考古发现、研究动态等在章节体中不易展开的内容都有了一定的位置呈现。

作为以断代史和王朝史为叙述对象的西夏历史,《西夏通志》大胆采用了传统史志体例与现代章节体例相融合的方式,将史、志、传、表作为基本结构。“史”为“西夏史纲”,以纵线时间脉络为主,集中阐述从党项到西夏政权的治乱兴衰和社会各方面的演进;“志”为“西夏史志”,采用传统地理志、经济志、职官志、军事志、部族志、语言志、文献志、文物志等分类编纂叙述的方法,但充分运用了新资料,内容更充实,阐释更有新意;“传”即“人物志”,对见于记载的西夏人物逐个立传;“表”包括世袭、帝号、纪年、交聘、大事、战事、词汇以及名物制度异译对照等。全书在中华民族史观的统领下,继承考证辨析的严谨治学方法,以现代学术规范为基本要求,

充分吸收传统体例的元素,力求做到史论结合、史志结合、出土文献和实物与典籍文献结合、西夏文献与汉文文献及其他民族文字文献结合、国内研究与国外研究结合,尽可能吸收国内外研究的新成果。这种编纂体例,虽然带有试验性,但体现了学术上守正创新的精神,体现了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积极探索。

经过10年的不懈努力,煌煌12卷400多万字的《西夏通志》终于呈现在读者面前,可以说,《西夏通志》的出版,在西夏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对于西夏学的过往来讲,是一次全面的总结和收获,对于西夏学的未来来讲,是进一步研究的起点。

(陈育宁,宁夏大学教授,宁夏大学原党委书记、校长)

为何要编纂一部大型的西夏史志

——《西夏通志》序

杜建录

元朝修宋辽金三史,没有给西夏修一部纪传体专史,给后人留下很多缺憾。现存资料无法编纂一部纪传体西夏史,当代章节体的西夏史又无法容纳更多内容。鉴于此,2008年就开始策划编纂多卷本历史著作《西夏通志》,2015年获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022年完成结项,2025年正式出版。该多卷本著作体裁介于“纪传体”断代史和“章节体”专史之间,将我国的史论和史志结合起来,在西夏史乃至中国古代史研究体例和方法上都是创新,这是本通志纂修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自明、清以来,封建史家有感于西夏史的缺憾,筚路蓝缕,拾遗补阙,撰写出多种西夏专史,重要的有明代《宋西事案》,清代张鉴《西夏纪事本末》,吴广成《西夏书事》、周春《西夏书》、陈崑《西夏事略》,民国初年戴锡章《西夏纪》等等。这些著作梳理了西夏史资料,特别是参考了当时能见到、现已不存的文献资料,值得我们重视。不过从总体上来看,明、清两代学者对西夏史的研究有较大的局限性:一方面,采取的是传统的封建史学观点、方法和体例;另一方面,黑水城文献尚未发现,西夏陵等重要考古尚未开展,所使用的资料仅限于传世典籍,因此,这些著作都不能够全面阐释西夏社会面貌。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夏史的研究又得到学界的重视,先后出版林芝《西夏史》(1975)、钟侃等《西夏简史》(1980)、吴天墀《西夏史稿》(1981)、李蔚《简明西夏史》(1997)、李范文主编的《西夏通史》(2005),这些成果各有所长,大大推动了新时期西夏史的研究。如果从研究的全面性来看,仍有一定的局限:一是章节体例无法容纳更多历史事实,前

四种都在三四十多万字以内,其中《西夏简史》不足10万字,即使由专家集体完成的《西夏通史》也是几十万字;二是地下出土文献尚未完全公布,特别是数千件俄藏西夏社会文书近年才公布,所利用的资料有限。因此,有必要运用新资料、新体例完成一部多卷本的西夏史。

国外西夏研究的重点集中在西夏文献,西夏历史方面的成果相对较少,主要有苏联克恰诺夫的《西夏史纲》(1968),日本冈崎精郎的《党项古代史研究》(1972)等。《西夏史纲》比较简略,且汉文资料使用上有较多错误;《党项古代史研究》侧重西夏建国前的历史;《白高大夏国:十一世纪夏国的佛教和政体》过分强调西夏佛教的地位。国外的西夏史代表作虽有参考价值,但也不能反映西夏历史全貌。此外,《中国通史》《辽宋西夏金代通史》《剑桥辽夏金史》也都有西夏史的内容。该成果或作为中国通史的一部分,或是辽金西夏断代史的组成部分。

除通史外,文献资料和专史研究也取得了很大成绩,文献资料整理研究方面,相继出版《俄藏黑水城文献》《英藏黑水城文献》《法藏敦煌西夏文文献》《中国藏西夏文献》《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古所获汉文文献》《日本藏西夏文文献》《西夏文物》。韩荫晟《党项与西夏史料汇编》,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史金波《西夏经济文书研究》《西夏军事文书研究》,史金波等译《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杜建录等《党项西夏文献研究——词目索引、注释与异名对照》《西夏社会文书研究》等。所有这些,将西夏历史文献整理研究推向了新阶段。

西夏专史方面,史金波《西夏文化》《西夏佛教史略》《西夏社会》,白滨《元昊传》《党项史研究》,周伟洲《唐代党项》《早期党项史》,汤开建《党项西夏史探微》,杜建录《西夏经济史》《西夏与周边民族关系史》,李华瑞《宋夏关系史》,杨浣《宋辽关系史》,陈育宁、汤晓芳《西夏艺术史》,韩小忙《西夏美术史》,鲁人勇《西夏地理考》等。这只是百年西夏学论著的一部分,还有大量论著收录在《西夏学文库》《西夏学文萃》两套大型丛书中,不一一列举。这些研究成果,为多卷本《西夏通志》的撰写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西夏通志》约四百万字,从内容上看,可分为四部分,一是“西夏史纲”,包括党项内迁与夏州拓跋政权建立、西夏建国与治乱兴衰、西夏人口与社会、西夏农牧业和手工业、西夏通货流通与商业交换、西夏赋役制度、西夏社会形态与阶级结构、西夏文化、西夏遗民等。

二是“西夏史志”,相当于“正史”中的“志”,包括地理志、经济志、职官志、军事志、部族志、语言志、文献志、文物志等,但内容和方法与“正史”中“志”大不相同,而是根据资料和当代学术的发展,赋予新的内容,显示出新的活力,如“地理志”中的西夏地图;“经济志”中的经济关系、阶级结构和社会形态;“职官志”中蕃汉官名;“军事志”中的战略、战术与战役;“语言志”中的语音和文字;“文献志”已不是传统《艺文志》中的国家藏书,而是所有地下出土文献和传世典籍文献(含典籍中记载而已佚失的文献),既包括西夏文献,又包括西夏时期产生汉文文献和其他民族文字文献。

三是“西夏人物志”,相当于人物传记,对目前见于记载的所有西夏人物立传,由于资料不一,每个传记多则近千字,少则数十字。

四是附表,包括《西夏世袭表》《西夏帝号表》《西夏纪年表》《西夏交聘表》《西夏大事年表》《党项与西夏地名异译表》《党项与西夏职官异名对照表》《西夏蕃名官号一览表》《夏汉官职译名对照表》《机构译名对照表》《西夏战事年表》《西夏人物异名对照表》《西夏部族名称异译表》《西夏沿边部族名称异译表》《西夏词汇表》《西夏学年表》等。

为了高质量完成书稿,课题组结合西夏文献资料特点,尽可能搜集多重证据,将地下出土文献和传世典籍文献相结合,西夏文献和汉文文献及其他民族文字文献相结合,《天盛律令》《亥年新法》《法则》《贞观玉镜将》等制度层面上的资料和买卖、借贷、租赁、军抄、户籍等操作层面上的资料相结合,国内研究和国外研究相结合。例如,《天盛律

令》规定“全国中诸人放官私钱、粮食本者,一缗收利五钱以下,及一斛收利一斛以下等,依情愿使有利,不准比其增加。”过去对这条律令不好理解,通过和黑水城出土西夏天盛十五年贷钱文契结合研究,可知一缗收利五钱为日息,一斛收利一斛为年息。

郡为秦汉以来普遍设置的地方机构,相当于州一级,下辖县,有时是州县,有时是郡县。一般情况下县级名称不变,而州郡名称互换,如灵州与灵武郡,夏州与朔方郡,凉州与武威郡,甘州与张掖郡,肃州与酒泉郡。西夏建国后承袭前代,在地方上设州置郡,以肃州为蕃和郡,甘州为镇夷郡。这条资料出自清人吴广成《西夏书事》,由于该书没有注明史料来源,往往为史家所诟病,研究者不敢确认西夏设郡。黑水城出土西夏榷场文书明确记载镇夷郡,为西夏在地方设郡找到了确凿证据,其意义不言自明。

一是考证辨析,对异见异辞、相互矛盾的史料,加以辨正,以求其是;辨析不清者,两存其说、存疑待考。例如,《天盛律令》记载有石州、东院、西寿、韦州、卓啰、南院、西院、沙州、啰庞岭、官黑山、北院、年斜等十二个监军司,有的名称和《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相同,有的不相同,要逐一考辨清楚。还如,汉文文献中的党项西夏地名、人名、官职名、族名,有的是意译,有的是用汉语语音写下来,不同的译者往往用字不同,出现了大量的异译;有的在传抄、刊印过程中出现讹、衍、误。以上种种现象,造成将一人误作两人,将一地误作两地,将一官职误作两官,为此,在全面系统搜集资料的基础上,对汉译不同用字以及讹、衍、误逐一进行甄别和考辨,表列党项与西夏地名、人名、官职名、族名异名对照。

二是分三步完成,第一步为按卷编纂“西夏通志资料长编”,将所有出土文献、传世典籍、文物考古资料,按照时间和门类编成资料长编;第二步对搜集到的西夏文献资料辨析考证,完成西夏史考异,对当代专家不同的认识,也要加以辨析,有的问题两存其说;第三步在资料长编和文献考异的基础上,删繁就简、去误存真、存疑待考,完成资料翔实、内容丰富、观点鲜明的多卷本《西夏通志》。

教育部西夏学重点研究基地建设伊始,确立了西夏文献整理出版、西夏文献专题研究以及西夏社会面貌阐释的“三步走”战略。《西夏通志》的纂修是该战略的重要环节,它的完成不是收官,而是起点!

(杜建录,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院长,民族与历史学院院长)

【责任编辑 王 涛】